

121
H393

917776

苏共新领导奉行 苏美合作路线的供状

《红旗》杂志评论员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一日)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六年·北京

**苏共新领导奉行
苏美合作路线的供状**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 · 字数 17,000

1966年2月第1版

1966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1·947 定价（四）0.12元

目 录

苏共新领导奉行苏美合作路线的

供状《红旗》杂志评论员 1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一日)

附:

苏共新领导鼓吹苏美合作的两本书18

苏共新领导奉行 苏美合作路线的供状

《红旗》杂志评论员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一日）

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的灵魂。苏共新领导上台以后，极力显示他们与赫鲁晓夫有所不同，装起一副反美的样子，企图掩盖他们继续推行这条路线的实质。然而，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他们在苏美合作方面，比赫鲁晓夫做得更加彻底，走得更远了。

苏共新领导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揭露他们的真面目，感到很恼火。他们破口大骂，说我们揭露他们的文章充满着“毫无根据的诽谤性和挑衅性的捏造”^①。

咒骂和诡辩是改变不了事实的。苏共新领导的大量言论和实际行动，他们的报刊文章，每天都在揭露他们自己。苏共新领导在一九六五年出版的一批宣扬苏美合作的书籍，也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在这一批书中，《美国对

① 苏联《真理报》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文章。

外政策的动力》和《苏联和美国——它們的政治关系和經濟关系》，是具有代表性的两本。

这两本书的主要論点是些什么呢？

《美国对外政策的动力》一书，是一九六五年由苏联科学院世界經濟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編輯出版的。这本书虽然不能不談到美国对外侵略的某些事实，說了一些指責美国侵略活动的話，但是它力图证明，这些坏事都是美国垄断資產階級的反动派干的，而同样代表垄断資產階級的美帝国主义头子却不属于反动派之列，这就是說，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是可以改变的。譴責美帝国主义，不过是表面文章，掩盖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才是全书的实质。

这本书把美国統治集团分为“冷靜的、明智的”和“好战的、侵略的”两个派別。书中說，“对外政策和軍事政策中冒险主义的和侵略的趋势同冷靜的和明智的趋势这两者之間的斗争，正日益强烈地席卷着美国的真正統治者队伍——国内最大垄断組織”。书中还說，“美国社会生活中两种对外政策趋向，即两个集团——极端反动的疯狂侵略派和傾向于明智地估計現有力量对比、傾向于和平共处的溫和和冷靜派之間的斗争已达极点。”

誰是这种“傾向于和平共处的溫和和冷靜派”呢？照这本书的說法，就是美帝国主义的头子，战后历届美国总统。书中說，艾森豪威尔“代表比較溫和的、无意实行自

己的冒险主张和冒大战危险的人士”；肯尼迪是“受人民欢迎的”总统，“眼界宽阔，冷静地对待国际生活的迫切问题”，“了解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约翰逊是个“非常慎重而温和的政治家”，“不倾向于政治冒险”，他“得到人民的绝对委任，去实现旨在巩固和平、消除‘冷战’、谋求苏美接近的政策”。

这些战争罪魁怎么会忽然变成了和平人士呢？这些人民公敌怎么会忽然变成了受人民欢迎的总统呢？书中这样为美帝国主义的头子涂脂抹粉，无非是为了推销苏美“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货色。书中说，“美国统治阶级或多或少地开始理解到，当前世界阶级力量的具有决定性的斗争场所是和平经济竞赛”。在“核世纪”，“只有疯人，只有自杀者，才能把战争作为自己政策的工具”，“美国政府在许多情况下都表示出了妥协的意愿”。书中说，只要苏美“和平共处”，“那么国际舞台上两种社会经济体系的竞赛和两个主要敌手的意识形态斗争，就将限定在没有流血冲突与战争的、广泛的经济、外交、科学和文化的竞赛与合作的范围之内”。

这本书宣称，“苏美关系，世界两大最强国家的关系，是世界政治的轴心，是国际和平的主要基础”。书中引用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的话，鼓吹“两大国——苏联和美国——对世界命运，对人类命运的特殊责任”。书中说，苏联“致力于同美国的和平与合作，认为苏美关系是当代

世界政治中的首要問題，是戰爭與和平問題的關鍵”。

那么，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轰炸社会主义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屠杀越南人民，会不会妨碍苏美关系呢？照这本书的說法，是不会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苏美之間也沒有任何冲突。这本书強調“苏美关系非常重要的特点”，是所謂“两国民族利益的共同性”。书中說，“除开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〇年美国参加对苏俄的軍事干涉这个污点之外，俄美和苏美关系沒有为任何軍事冲突和戰爭的烏云所籠罩。”“就是在現在，两国之間并不存在任何領土的、經濟的爭執和冲突，它們的民族利益，無論是在全世界範圍內，或者在任何局部地区的範圍內，都沒有互相冲突”。

《苏联和美国——它們的政治关系和經濟关系》一书，是一九六五年由苏联科学院世界經濟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批准出版的。这本书論述了从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的苏美关系史。它不能不提到美国侵略和敌視苏联的历史事实，但是，它的落脚点仍然是苏美合作，它強調“苏联旨在同美国建立全面合作的政策是不变的”。

为了替苏共新領導的苏美“全面合作”政策辯护，这本书不惜歪曲历史，硬說“苏維埃国家从其成立最初之日起就始終一貫地奉行同美国全面合作的方針”，“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一年苏美关系的历史令人信服地表明，苏联和美国之間的和平共处、友好合作，既符合苏联和美国人

民的利益，也符合其他各国人民的利益”。书中还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的苏美合作，为永远结束美国统治集团战前的不现实的和缺乏远见的对苏政策，为发展战后时期卓有成效的苏美关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为了给苏美合作的政策制造根据，这本书极力渲染当今的美国统治集团是爱好和平的。书中说，现在“美国有势力集团中比较有远见和头脑清醒的代表人物，都主张实行比较现实的对外政策”，“他们清楚地理解到，在现时的国际局势中，美国和苏联之间唯一可以接受的合作基础是和平共处及在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和其他方面进行竞赛”。

这本书强调，“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贯认为苏美关系的正常化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书中搬出了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对赫鲁晓夫报告的决议中的这一论点：“改善苏联和美国的关系，对于促进国际局势的健康发展，会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苏联和美国是两个对普遍和平的命运负有特殊责任的国家。”

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本书的腔调，同赫鲁晓夫的言论是一模一样的。赫鲁晓夫说过，“整个国际局势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美国 and 苏联之间建立什么样的关系”^①，“历史把对世界命运的巨大责任加于我们两国人

① 赫鲁晓夫一九六一年九月八日在苏联、印度友好大会上的讲话。

民身上”^①，苏美两国的“利益在任何地方都不发生直接冲突，無論在領土問題上还是在經濟方面”，“我們完全可以共处”^②。赫魯曉夫的徒子徒孙，不过是照着葫芦画瓢而已。

很显然，这些书，完全是根据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和苏共綱領的修正主义路綫写成的。书中的話，就是苏共新領導所要說的話。这些书的出版，又一次证明了苏共新領導奉行着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义，证明了他們的苏美合作的思想，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貫的，他們追求苏美合作，不是个别的言行，而是根本的路綫。这些书，就是苏共新領導奉行苏美合作路綫的供状。

乍看起来，这两本书用了不少篇幅叙述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罵了美国的反动派。但是，只要仔細看一看，就不难发现，书中只是泛泛地譴責美帝国主义，而对美国統治集团的当权派，却极尽其吹捧之能事。尽管书中表示苏联反对美国的侵略活动，然而說來說去，总是乞求苏美合作。这种小罵大帮忙的手法，无非是为了欺騙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为美帝国主义更好地效劳而已。

这两本书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它們是很好的反面教

① 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日給美国总统肯尼迪的新年賀电。

② 赫魯曉夫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日同美国出版商考耳斯的談話。

材。它們揭穿了苏共新領導現在玩弄的种种欺騙手腕。

苏共新領導說，他們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事实怎么样呢？正是在美帝国主义疯狂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一九六五年，他們出版了这样一批宣揚苏美合作的书，宣称“苏联旨在同美国建立全面合作的政策是不变的”。苏共领导人自己也多次出馬，亲口說明了这一点。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在一九六五年五月說，“我們主张发展和改善同美国的关系”^①。苏联部长會議主席柯西金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在同《紐約时报》記者賴斯頓的談話中說，苏美两国“从长远前景的观点来看，主要的應該是，組織一切力量来抵制战争”，苏美两国應該動員自己的力量，“把这些力量用于发展合作和寻求各种爭端的解决办法”。^② 这那里是什么反对美帝国主义呢？这些話难道不都是苏共新領導坚持苏美合作的自供嗎？

苏共新領導装模作样地說，“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沒有改变”。人們可以看看，他們在自己出版的书中究竟是想证明什么。他們同赫魯曉夫一样，把美国統治集团的当权派說成是“明智派”，說这些人“願意和平共处”，“認識‘核世紀’的現實性”，懂得“只有自杀者，才能把战争作为自己政策的工具”。这岂不是等于說，美帝国主义的代

① 勃列日涅夫一九六五年五月八日在苏联人民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

② 柯西金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六日同美国記者賴斯頓的談話。

表人物并不是奉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美帝国主义不再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了吗？这些论点不是明目张胆地宣传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了吗？

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内部尽管有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集团之间尽管有剧烈的利害冲突，他们在奴役国内外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统统都是反动派。美国统治集团在反革命的方法上虽然有不同的主张，经常吵吵嚷嚷，这个说这种反革命方法好，那个说那种反革命方法好，但是，他们在维护国内反动统治和侵略世界各国的根本政策上，是完全一致的。世界上绝没有什么超阶级的“明智”。如果说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什么“明智”的话，那不过是维护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明智”，对内压迫本国人民、对外掠夺世界人民的“明智”，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明智”罢了。苏共新领导热衷于在美国统治集团中划分什么“明智派”和“反动派”，他们的实际用意，除了替美帝国主义打掩护，帮助美帝国主义者麻痹世界人民，又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

苏共新领导有时也骂几句约翰逊。这不过是一种烟幕。这些书表明，他们同赫鲁晓夫一样，把美国总统说成是和平的天使，美国人民的绝对代表。他们这样做，道理也很简单。这是因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总是把他们的赌注压在美帝国主义头子的身上，不论谁当了美国总

統，他們都要極力地加以美化。

事實一次又一次地打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的耳光。當代美國的總統，那一個不是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工具呢？約翰遜自己並不掩飾這一點。他在美國商會一九六四年年會上對美國壟斷資本家說，“你們都是本政府的股東”，“我在進行你們雇用我來做的工作”。從杜魯門、艾森豪威爾、肯尼迪到約翰遜，他們獨霸世界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是一脈相承的，而且越來越發展，越來越瘋狂。“約翰遜主義”就是當代的法西斯主義。它赤裸裸地宣布，要使用武力來干涉世界上一切地方的事情，推翻世界上一切美國所不喜歡的政府。約翰遜政府正在戰爭冒險的道路上逐步升級。“約翰遜主義”是美帝國主義更加好戰、更加冒險的表現。蘇共新領導不顧一切地給美帝國主義頭子臉上貼金，只能給他們自己出丑。

蘇共新領導說，他們是“恪守列寧遺訓”的。他們究竟是怎樣對待列寧的呢？他們在這些書中，竟然把列寧說成是蘇美“全面合作”政策的創始人，把蘇美關係的歷史描繪成一部實行“全面合作”的歷史。這不是對列寧的背叛，對歷史的歪曲，又是什么呢？

十月革命勝利以後，美帝國主義積極參加了武裝干涉新生蘇維埃國家的帝國主義十字軍。在武裝干涉失敗以後，美帝國主義繼續用“飢餓的繩索”，企圖阻擋蘇聯的發展。在列寧和斯大林領導的時期，蘇美關係充滿着尖

銳的复杂的斗争，这是国际无产阶级同国际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剧烈斗争的表现。苏共新领导要在苏美关系的历史中抹去阶级斗争的内容，这是篡改历史，这是污辱苏联人民。

列宁在世的时候就指出，美帝国主义是“消灭俄国自由的刽子手和宪兵”^①，扮演了“世界革命的绞杀者和刽子手的角色”^②。列宁号召，“要毫不调和地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这个最后参加资本家为瓜分利润而进行的世界大屠杀的最新最强的帝国主义”^③。列宁的这些話，今天我們讀起来，还是那么清新！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打出列宁的旗帜来掩护自己，但是，列宁的話恰恰最有力地揭穿了他們的面目。

苏共新领导說，他們是忠实于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但是这些书表明，他們是在說謊。宣言和声明指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這些书却大談其苏美友誼。宣言和声明指出，全世界人民必須結成最广泛的統一战綫，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這些书却极力鼓吹苏美合作。他們所

① 《莫斯科党工作人員大会·关于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九〇頁。

② 《全俄工、农、哥薩克和紅軍代表苏維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形势的演說》。《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一四一頁。

③ 《給美国工人的信》。《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四十三頁。

忠实的，还是所謂“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赫魯曉夫修正主义总路綫。他們抬出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来，不过是采取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老手法，表面上承认它，实际上閹割它的革命原則，用漂亮的詞句来掩盖他們反对革命的本质。

苏共新領導說，他們是承认各国人民在反帝斗争中的作用的。但是在这些书里，他們毫不掩飾地宣揚强权政治，活現出一副大国沙文主义的神气。在他們眼里，世界的命运是要由苏美两国的統治者来决定的，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都应当圍繞着苏美軸心打轉，全世界人民的生存都只能仰賴于苏美两国統治集团的恩賜。这难道不是证明，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梦寐以求的，就是苏美合作主宰世界嗎？

苏共新領導假惺惺地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革命人民有着“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利益”，并且一再表白他們是忠实于无产階級国际主义，支持各国人民革命的。但是，他們在这些书中大事宣传的，却是苏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这样两种“共同利益”，是截然相反的，是水火不相容的，怎么能够扯到一块呢？美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人民的公敌。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一心要跟美帝国主义者讲什么“共同利益”，这只能說明他們把屁股坐到美帝国主义那一边去了，他們把自己置于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人民相对立的地位。

按道理說，社会主义的苏联同帝国主义的美國之間，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國家，要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就必然在全世界範圍內，在任何局部地区的範圍內，同美帝国主义发生尖銳的斗争。現在，苏共新領導却強調，他們同美帝国主义之間，“無論是在全世界範圍內，或者在任何局部地区的範圍內，都沒有互相冲突”。这只能表明，在他們的心目中，世界範圍內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早就不存在了，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义务早就不存在了。他們已經墮落到資產階級民族利己主义的泥坑里，再沒有一絲一毫的无產階級国际主义氣味了。

苏共新領導強調苏美兩國的“共同利益”，这完全是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肯尼迪早就要苏共領導“只照管它的本国利益”，同美国“达成能保障我們两大国的利益”的協議^①。从赫魯曉夫到苏共新領導，都积极地响应美帝国主义的号召。他們的确同美帝国主义者有着共同利益，这就是他們所代表的苏联資產階級特權階層和美国壟斷資本集團的共同利益，这就是苏美合伙反对世界革命的共同利益。

苏共新領導在这些书里所闡述的苏美合作的政策思想，早已付諸行动。最近一个时期，他們为了追求同美国

① 肯尼迪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对苏联《消息报》总編輯阿·伊·阿朱別伊的談話。

的“共同利益”，大大加紧了同美帝国主义的勾結。

苏美印三家在新德里会見，公开加强反华联合陣綫。美国副总统汉弗萊在同苏联部长會議主席柯西金进行了長時間的会談以后，毫不掩飾他的滿意心情。汉弗萊在电视講話中說，这次会談是“坦率的、直言不諱的”，他在会談中說明了美国政府的立場，并且“也从柯西金先生那里得到了响应”。汉弗萊說，“苏联正试图在共产党中国周围建立一道遏制的墙”，“苏联政府今天对于自己在全世界各地与共产党中国之間的关系的关切，比对于美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可能做的任何事情更关切得多”。汉弗萊认为，“展望今后几年”，美国同苏联的“接触将会扩大，关系能够改善而且應該改善”。①

汉弗萊的談話表明，苏美之間的合作达到了何等亲密的程度。汉弗萊对于苏共新領導的政策这样有把握，敢于公开这样讲，是因为他們互相交了底。苏共新領導的政策，就是要联合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一个反对中国的反革命包围圈。苏共新領導的这种政策，完全符合美帝国主义的心意。美帝国主义者很自然地要拍手欢迎，加以支持和鼓励。这就是苏美新德里会談的实质。这是苏共新領導最突出的叛变行动。如果事情不是这样，苏共新領導为什么沒有对汉弗萊的講話辟謠呢？

① 汉弗萊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六日对美国記者的电视談話。

在越南問題上，苏美勾結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正当美国“停止轰炸”，掀起一陣“和談”喧嚣的时候，謝列平仆仆风尘訪問河內，紧密配合美国的“和談”阴谋。苏共新领导还同美国在欧洲局势問題上达成了默契，使美国能够从欧洲抽調越来越多的兵力到越南来扩大战争。苏共新领导現在讲一些支持越南的話，給越南一些援助，无非是企图在越南問題上增加自己的发言权，企图挑撥中越关系，企图帮助美国实现“和談”阴谋。归根到底，他們是要在越南問題上为美帝国主义找出路，让美帝国主义永远霸占越南南方，同美帝国主义做成一笔政治交易。

苏共新领导这种立場，美帝国主义者很清楚。美国总统特別助理麦·邦迪說，“长期以来，我們一直很清楚：苏联政府希望能够取得和平解决”^①。美国报纸說，“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苏联和美国事实上是在并行的軌道上向着它們共同持有的某种目标前进”^②。美国报纸还說，如果苏联“最終将帮助取得一种可以为人們所接受的越南解决办法的話”，美国将可以“从一种危急的局面中脫出身来”。“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下，目前苏美关系的根本之点在于，这种关系必須是一种默契的关系”，“美苏之間的矛盾必須繼續是公开的，它們之間的一致却必須繼續是不讲明的”，“它們既是公开的敌人而同时又是暗中

① 麦·邦迪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六日对美国記者的电视談話。

②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三日評論。